



OSID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季淑凤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红楼梦》;译者群体;20世纪前半期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4)01-0031-06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新文学系统在外来文化的帮助下已基本确立,这其中内蓬勃发展的西学思潮的译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同样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也给西方社会送去了耳目一新的中国风尚。就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而言,早在19世纪初,西方学者便意识到其中的语言功用和文化价值,纷纷对《红楼梦》进行译介,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和了解逐渐加深。不过,这些译本只节选了部分章节进行翻译。进入20世纪,有更多的译者参与《红楼梦》的译介,截至1958年第一本全译本出现,先后共有10位《红楼梦》译者,分别是吴宓、霍道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威妥玛(Thomas F. Wade)、哈德逊(Elfrida Hudson)、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lorence McHugh and Isabel McHugh)、袁家骅、石民。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这段时期内的英译群体和英译活动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鉴于此,本文以该译者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其文化身份对他们翻译活动的影响,分析该译者群体在《红楼梦》英译过程中受到译入语文化元素制约时做出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上的决策,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的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着《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从而在更大的

文化层面上更好地展示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

一、译者群体与历史背景

(一)译者群体

译者群体是以人群为单位划分的译者群,从气质上可分为学者型译者和作者型译者,从领域上可分为职业译者和业余译者,从理论素养上可分为翻译界内和翻译界外的译者,从国别上可分为国内译者和国外译者^{[1]165}。与19世纪《红楼梦》只有外国译者不同的是,20世纪前半期中外译者均有参与。具体来说,打破了19世纪《红楼梦》译者主要为在华英国人的格局,其译者除了在19世纪便已经来华的英国人威妥玛,更多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译者有在国内的译者,如霍道彝、袁家骅、石民,也有在国外(美国)的译者,如吴宓、王际真。美国译者有在华的译者,如艾思柯、哈德逊,也有在美国本土的译者,如麦克休姐妹。这一时期的《红楼梦》译者身份多元,有汉学家艾思柯、威妥玛,有中国大学生霍道彝、留学生吴宓,有汉学家兼翻译家哈德逊、王际真、麦克休姐妹,也有翻译家兼编辑袁家骅、石民。20世纪前半期的《红楼梦》译者无论身份、国籍、地域都与19世纪的译者大不相同,其原因要结合当时

收稿日期:2023-09-0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早期英语汉学界的《红楼梦》译介与红学谱系研究(1812—1929)”(AHSKY2022D194)

作者简介:季淑凤,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

的历史语境方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二) 历史背景

晚清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统治者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致使国人眼界大开。而随着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接连战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境地,中国人民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尝试从“西学”中寻求救国良策。彼时,政府自上而下的“西学东渐”已成汹涌大潮,而“中学”日益式微。传统的科举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社会对新知识、新人才需求的障碍。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传统知识分子由“士”入“仕”的后路,大多数知识分子进入了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而实施“新政”兴建的各式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据统计,“1904年新式学堂学生有近10万人,次年有近26万人,1906年则高达近164万人”^{[2]19}。“到辛亥革命前一二年,留美学生有650人,留欧学生约500余人。”^{[3]156}自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仅由“庚子赔款”派遣的赴美留学生就达近2000人,人数在美国的各国留学生中遥遥领先^{[4]28}。无论是进入新式学堂还是出国留学,都有对语言的要求,美国在“庚子赔款”资助中要求留学生“英文程度能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课”^[4]。1904年,清廷为新式学堂颁发的《邹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强调“外语为‘必需而最重之功课’……而且要求学二门以上外语”^{[5]30}。这一时期留美人数的增多与当时美国实行的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策略密切相关。同时,出于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如中国太平洋学会(1925年)、华美协进会(1926年)、远东研究促进会(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还成立了一些重要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它们也资助来华留学的美国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就是该时期在燕京学社奖学金的资助下来中国留学的。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中美两国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汉学在该时期内也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由曾经的汉学“荒村”一跃成为汉学“重镇”。《红楼梦》的译介尤其是多个节译本的出现正得益于该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

二、译者群体与译介目的、翻译选材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是兼有译者身

份的语言人和其他身份的社会人。“译者无不受到译者所处复杂社会环境的制约,所以其社会性总体上要高于其语言性。”^{[1]28}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作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连的^{[6]245}。基于对英译本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先分析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在文本选择上有着怎样的考量与译介目的、读者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 服务语言学习的需要

《红楼梦》作为海外汉语学习材料的价值在19世纪便引起西人的注意,一个世纪以来“走过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历程”^{[7]311},在20世纪同样得到了重视,只不过不是西人用来学习汉语的材料,而是中国人用来学习英语的材料。1921年,中国大学生霍道彝在其入学的税务学校《税务专门学校季报》上分别刊登了两篇《红楼梦》英译片段。其中,一篇译文节选自第9回开篇宝玉与袭人在宝玉要去读书前的一段对话,另一篇选自第42回黛玉与宝钗关于读“不正经的书”的一段对话。两篇译文排版相同,原文在上,自右起繁体竖排;译文在下,采用了英语国家常用的左起横排方式,透露出很明显的汉英翻译的痕迹。当时他就读的税务学校专业课程所用教材几乎都是英国海军或美国高校的英文教材,教师用英文授课,学生作业也用英文写作。因此,为达到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所要求的“深通中外文字”“英文造诣较好”的目标,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霍道彝是《税务专门学校季报》的“翻译”“翻译练习”栏目中最为活跃的译者之一,两篇译文只是他译作中的一部分。选择“袭人劝导宝玉读书”与“黛玉与宝钗谈论‘读闲书’”这两则主题进行翻译与霍道彝作为税务学校学生的身份相契合。这两篇译文“呈现的是中国译者在20世纪早期中西文化碰撞、英语学习语境之中,为《红楼梦》中英双语转译而进行的本土开创之举”^{[8]328}。

(二) 介绍中国文化的需要

早在19世纪之初,来华西人便意识到小说在了解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威妥玛、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斯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都从自己个人经历和汉语教学实践出发,得出中国通俗小说是西人学习中国文化最有效的知识来源。在此背景下,《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自然引起了西人的注意,并被不断译介。1911年,《红楼梦》被列为中国海关洋员的文化读本。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进入20世纪后,西方除了以前常关注的

饮食、服装、风俗、医药等,还开启了对《红楼梦》原书艺术进行多维度研究的先河^{[9]267}。1923年,汉学家艾思柯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的第1~4期上以《中国人的园林观》(*The Chinese Idea of Garden*)为题发表连载文章,其中涉及《红楼梦》的译介,坦言“想要掌握中国哲学知识,就必须要先了解中国园林”^{[10]15}。由此可见,艾思柯译介《红楼梦》,更确切地说译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其目的是借以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人的哲学观。文章中大观园元妃省亲一段近乎全部引自19世纪的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译本,因艾思柯认可乔利的译文,认为其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保留了《红楼梦》口语对话中的语言风格,译文极为忠实,而文中涉及的对联、诗歌等则由艾思柯亲自翻译。究其原因,除了当时诗学传统的因素,更与她本人身份及对中国诗歌的喜爱密切相关。艾思柯出生于中国,在美国接受教育,又在中国生活近40年,后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终身讲习教师,自称“爱诗客”,曾与美国意象派桂冠诗人合译了《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 Poems from the Chinese*),她的中国诗歌英译文不仅广受读者欢迎,也对美国诗歌的现代转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1]31}。

(三) 满足异域风情的需要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废墟让人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的副作用,对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以及内心的空虚让人们开始怀疑主流的价值观念,期望寻求外在的拯救和寄托。西人对中国的想象从16~18世纪“理性之乡”到“中国情调”再到19世纪“多面的中国”,位于遥远东方的中国是一个可以进行异域想象的理想的“乌托邦”。因此,20世纪前半期,西人又纷纷将视野转向中国,开创了一个中国热的新时期。1921年,吴宓在美国波城留学时,当时的中国女留学生为华北水灾募捐而举办了一次晚会,此晚会专为波城的富豪、巨商以及前往中国商议财政之要员而举办,因此所选择的故事必须要符合观众的口味、要能打动观众才能达到募捐、赈灾的目的。为加强宣传效果,吴宓接受了《波士顿星期邮报》(*Boston Sunday Post*)编辑的提议,选取《红楼梦》“最热烈的爱情场面”进行翻译,然后在报中刊出。报社编辑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不会是为了介绍《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而是尝试引导美国的上层社会在中国寻找自己爱情的“乌托邦”。寻找“爱情乌托邦”的目的在1929年王际真出版的第39回节译本中也得以体现。该书只译出了关于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部分,对其余无直接关系的内容进行了大

量删减。这种异域的爱情悲剧对西方读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王际真于1958年增译的60回节译本以及同年出版的麦克休姐妹的译本都主要译介了宝黛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汉学传播边缘地带的美国,在汉学传播核心地域的中国也同样出现了。汉学家哈德逊于1928年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期刊《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原《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的第8卷上发表了长达7页的《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主要以宝玉、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爱情为主线。1933年,袁家骅与石民合译本也主要译介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几种节译本所做出的取舍强化和印证了主流的英语本土文学观念——几个世纪以前莎士比亚所提出的“爱情宣言”,广义的生命悲剧经过编译变成了狭义的爱情悲剧^{[12]96}。

三、译者群体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一) 译者群体的社会共性特征

译者不仅是翻译行为的语言人,而且是社会行为的社会人,很多时候译者要根据社会需求对原文进行改造。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译者群体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读者的惯习而对原文进行了种种调整和改造。

1. 删减原著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红楼梦》原著过长的篇幅让西方读者望而生畏。1867年,梅辉立(William F. Mayers)就指出《红楼梦》宏大的篇幅对西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莱比锡岛屿出版社从德国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接受出发,对库恩(Franz Walter Kuhn)译本的篇幅做出了要求——不能超过800页。出于对读者接受程度的考量,库恩的几个节译本都对原著进行了删减。20世纪20年代,出版社在看到中国作品在美国的商机后,希望王际真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尽快译出《红楼梦》。王际真保留宝黛爱情故事的主线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减,同时在序言中说明“他也试图保留所有表现中国特点的风俗、习惯或文化特质的片段和章节”^{[13]20}。王际真的译文无论是爱情故事的叙述还是风俗的铺陈,都迎合了西方读者对来自古老中国的“异域风情”的期待,该译本出版后的畅销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1958年的版本在此基础上扩充了一倍,在序言中,王际真坦诚自己之前仅仅关注宝黛爱情悲剧,删除了大量关于大家庭纷争的描写,较为遗憾,因此在新译本中,在保留爱情悲剧主线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家庭生活的描写,这显然是意识到读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期待而进行的

扩充。而同年麦克休姐妹根据库恩译本进行的转译也是以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对西人无法理解的诗词、心理描写等进行了删除。该时期的几个译本也采取了类似的删减方式,都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普通读者的接受力为考量而进行的共同的翻译行为。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对《红楼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无疑是一次从片段介绍到整体呈现的重大突破”^{[14]219},借此,西人得以窥见《红楼梦》故事的概貌。

2. 添加副文本以助读者接受

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前者包括书名、署名、赠言、题记、序跋、内标题、注释等,后者是书籍公开的和私人的历史^{[15]18}。在19世纪的《红楼梦》译介中,副文本较少出现,而20世纪前半期的译者群体一般会在译文前采取添加序言的方式,提供译作的背景知识。例如1923年,艾思柯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译文前,作者对《红楼梦》的主题及修建省亲别墅大观园的原因进行了简要介绍,为后面的译文做了铺垫。王际真在1929年的缩译本中专门请英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写了一篇5000字的序言,主要介绍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来源、独创之处及小说性质等内容,另外自己还写了一篇7000字左右的序言补充小说背景。他的1958年的译本则请大学教授兼诗人的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做序,对《红楼梦》的地位、主要内容、主旨等进行了阐述。麦克休姐妹在1958年根据库恩译本转译了《红楼梦》,并将库恩译本中的后记摘译过来作为译本的序言,对小说的历史背景、作者思想、社会意义及艺术成就都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这些序言呈现出以该译者群体为代表的西人对《红楼梦》理解和接受的历史,也折射出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历程。这些由译者或他人所做的各种序文,构成了围绕正文本的主要副文本,起了导读的作用,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语境。其中的“深度批评”有助于考察《红楼梦》被接受、被认知或被阐释的历史,有助于确立作品的文学史定位。通过对这一阶段序言的解读,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期西人无论是对原著作者、作品内容还是小说主题、版本、文学地位等的理解都大大超越了19世纪时期。

除了序言,该段时期内,译者倾向于将文中无法表达的意思采用脚注的方式,对原文的一些文化习俗进行补充说明。王际真在翻译带有双关含义的人名时,采用先音译、后加脚注的方式,如“甄士隐”译

为“‘Chen Shih-yin’, homophone for ‘true matters concealed’”^{[16]5},“霍启”译为“‘Huo Chi’, homophone for ‘trouble begins’”^{[16]12},库恩译本、麦克休译本以及后来的霍克斯(David Hawkes)译本等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这样的翻译虽然不能再现原著表达隐含意义的人名谐音双关语,但也呈现了名字的异质文化性,同时表达了名字所负载的深层寓意,以便读者了解这些名字的文化内涵。

3. 借用对比以助读者理解

无论是在华的西人汉学家还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华裔汉学家、翻译家,由于他们置身异域,很容易发现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差异,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比较意识,在看待异域文化时,天然地具有一种他者的视野。无论是在为赈灾演出而翻译的《红楼梦》的故事纲要里,还是在为演出而进行的宣传中,都可见吴宓采用了显而易见的归化策略。在对《红楼梦》全书的主旨和故事纲要的译述中,吴宓首先肯定了《红楼梦》是中国所有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然后引用了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对《红楼梦》的评价,还特别将该书的篇幅与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 Harlowe*)进行对比。他对宝玉的描述则一直用西人所熟悉的济慈、柏拉图的理念进行相关联系,以拉近这部小说与读者的距离,减少读者观赏时的陌生感,最后作者不忘提醒,《红楼梦》主要讲述了一个忠贞的爱情故事。而在《波士顿星期邮报》(*Boston Sunday Post*)中以“*Chinese Love-Play in English for Post*”为题所进行的宣传中,他直接将《红楼梦》比勘为“中国文学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and Juliette*)”,作者是曹雪芹,中国的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且不说这种比附是否恰当合适,但是用西方国家熟悉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比照的方式有助于吸引西人的注意力,减少观众对东方文化的陌生感,可使其迅速融入情节中,容易引发共鸣。事实上,这种中西比附的方式并非吴宓的首创,在19世纪也时有发生。梅辉立在《中日释疑》中译述《红楼梦》时,曾将曹雪芹与萨克雷进行对比。马克·范·多伦在1958年为王际真译本所做的序言中把王熙凤称作女马伏里奥(Malvolio)(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伯爵小姐奥利维娅的管家,能干但心狠手辣);他还介绍宝玉和宝钗的结婚类似雅各(Jacob)和利亚(Leah)(在《圣经》中,雅各爱的是拉结(Rachel),但却被掉包娶了利亚);宝玉和黛玉日常相处中的吵架则类似“培尼狄克(Benedick)和贝特丽丝(Beatrice)”(《无事生非》中的两个人物,明明相爱,但不

肯承认,还经常争吵)。这种将原作比附于英语文学经典以提高译本身价的做法,有助于引导读者在自己所能理解的视域中去理解《红楼梦》,让原著去靠近读者,以读者接受力为考量的译介无疑减少了文化的隔阂,有助于译本在英语国家的热销。

(二) 译者行为的翻译策略

1. 以归化为主

该译者群体除了威妥玛的译文和霍道彝的两段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其余的出于迎合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和市场化的需求,多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以达到帮助西人读者通过小说来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以务实为上的翻译策略。如吴宓在其《吴宓自编年谱》中提到他应《邮报》编辑要求翻译“晴雯临终,宝玉往返”这一段故事。细读这段译文可以看出,吴宓运用了一些直译、意译方式,也用了很多归化翻译的策略。如文中“阿弥陀佛”这一佛教口头语,他直接归化翻译为西人所熟悉的“Thanks to God”。而晴雯所说的“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我就好回去了”是一种对死亡的委婉表达方式,吴宓用了英语中常见的死亡委婉语“I will find Paradise”进行对应,减少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可能对读者所造成的理解障碍和困难,使读者能紧跟剧情的发展。这种归化翻译策略在王际真先后两个译本中都较为常见。为了便于读者接受,译文大都用了较为浅显易懂的现代英语进行翻译,“就如原作一般口语化”^{[16]5-6},下面试比较王际真译本(王译)和乔利译本(乔译)翻译宝玉前去吊唁秦可卿的场景。

原文: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哄哄人声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贾珍哭得泪人一般。^{[17]133}

王译:The main gate of the East Mansion was wide open and ablaze with light. The mourners had gathered, and soon the sound of weeping and wailing shook the whole mansion... Chia Gen was bathed in tears.^{[16]93}

乔译:The main entrance wide open, the lamps on the two sides giving out a light as bright as day, and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in confused and large numbers; while the sound of the weeping inside was sufficient to shake the mountains and to move the hills... Chia Chen wept so bitterly that he was like a man of tears.^{[18]136}

上述译文中,王译用了36字,乔译用了60字,二者对比,可见乔利明显是逐字逐词地翻译,不敢添

加或减少任何信息,体现出对原著的高度忠实,这符合乔利将《红楼梦》作为语言学习辅助材料的功用。相较而言,王际真意译的内容更多。如“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乔利忠实地译为“the lamps on the two sides giving out a light as bright as day”,王际真则简要地译为“ablaze with light”;“摇山振岳”,乔利译为“to shake the mountains and to move the hills”,王际真认识到原文所采用的夸张手法,便意译为“shook the whole mansion”;“哭得泪人一般”,乔利译为“like a man of tears”,王际真则采用读者更为熟悉的表达方式“bathed in tears”。王际真的译本简洁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符合译者将绝大多数普通读者作为预期读者的定位。

而在麦克休姐妹的翻译中这种归化策略更为突出。例如,原著第46回有一句,王熙凤借老太太之口,说出对贾赦纳妾的看法:“太太听听,很喜欢咱们老爷么。”麦译:“You can see from this that the old *Tai tai* is not overly pleased by your husband's ways.”^{[19]280}王熙凤说这段话的对象是她的婆母、贾赦的妻子邢夫人,是晚辈对长辈的关系。“not overly pleased by”体现了当代英语直率的表达方式。麦克休姐妹的陈述句译文不仅语气强硬,而且没有使用敬语词汇,尤其是句子主语直接使用第二人称“you”,并且将“老爷”(王熙凤的公公)译为“你的丈夫”(your husband),将邢夫人与王熙凤婆媳之间长辈与晚辈的等级关系演化为一种平等关系,失去了说话人应有的恭敬态度,然而这种处理更符合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人物关系。

2. 创造性翻译策略的尝试

在20世纪前半期的《红楼梦》翻译中,创造性翻译也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人物名字的翻译上。《红楼梦》里的人物有400多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这也是除了篇幅,西人不敢靠近这部巨著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与19世纪西人翻译《红楼梦》里人名时一般采取音译的方式不同,这段时期内,王际真译本、麦克休姐妹的转译本皆采用了男名音译、女名意译的创造性的翻译策略。他们翻译人名有时对照字面意思翻译,如晴雯(Bright Design)、麝月(Musk Moon)、秋纹(Autumn Sky),有时按照性格翻译,如袭人(Pervading Fragrance)、鸳鸯(Loyal Goose)、平儿(Patience),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到原文的诗词歌赋及判词等暗含人物姓名的特点,使译文读者感受到诗词歌赋中隐含的人物身世结局或情节发展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特色^{[20]336}。吴宓在王际真译本出版不久,即对其做出评论,认为“此法殊善”。

库恩在1932年的德译本中也采用了此法,从其读者接受来看,该策略受到许多德国读者的认可。汉学家梅蕙华(Eva Müller)在一次采访中,也直言“库恩对于《红楼梦》小说人名的翻译基本是成功的”^{[21]14-17}。这种男名音译、女名意译的策略,可以让读者既能感受到中国人名的异质性,又能体会到中国人名的深层寓意,也体现了译者在原文求真和译语务实之间所做出的努力。

创造性翻译的尝试还体现在艾思柯对《红楼梦》诗词的译介中。1923年,艾思柯在《红楼梦》译文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拆字法”对其中涉及的对联和诗歌进行重译。例如,宝玉在沁芳亭题了一副对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艾思柯将“篙”拆分为“竹子”“船蒿”,因此译为“green bamboo boat-poles”,这样比单独地译为“bamboo”更为准确。再有“翠”字,她也拆分引申为“翠鸟(kingfisher)”,既对应了“翠色”(green),又添加了灵动的动物意象。《红楼梦》中的对联隽洁而含蓄,艾思柯通过拆字法营造出的意象更为鲜明,这种译介是《红楼梦》被真正地作为文学作品翻译前的一次尝试,促进了《红楼梦》世界文学经典地位的逐步形成与确立^{[22]254-269}。

四、结语

进入20世纪,随着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转型期。19世纪作为海外汉语学习教材的《红楼梦》的各种摘译、节译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且随着传教士、外交官的退场,1912—1958年这一时期留学生、华裔学者、汉学家、翻译家、编译家逐渐扛起了翻译《红楼梦》的大旗。他们主要基于自身的译者角色进行选材,或选择跟自己大学生身份相关的学校生活片段进行翻译练习;或基于自己的爱好,从中选择一些对联、诗词等进行创造性翻译,从而传播中国文化;或鉴于自己具有双重文化的优势,顺应市场的需求,将《红楼梦》缩译为感人的爱情故事,以满足西人对古老中国的异国情调的审美期待。为此,译者发挥自己作为翻译内语言人和翻译外社会人的角色,以目标读者的接受力为考量,对原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删减,尽量使原文靠近读者,出现了多个节译本共现的局面,使得《红楼梦》在该时期以完整清晰的全貌形式出现,在英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然,归化策略的运用会减少异域文化之间的隔阂,但同时也会导致原著本来价值的湮灭,误读、误译时有发生,致使《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在域外传播过程中遭受误读、误解。然而,“翻译是一个由一系列选择贯穿其间的过程,这种种选择都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产物,既取决于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与理解,也与时代对翻译的需求及其为翻译提供的可为空间密切相关”^{[23]6}。1932年,库恩在批评王际真译本篇幅、编译策略及细节处理等方面不足的基础上重译《红楼梦》,以期把一道美味的中国“食品”献给读者。1958年,麦克休姐妹选择全文转译库恩版本,自然也是对库恩所持观念的赞同。而同年,王际真本人也重新翻译了《红楼梦》,在介绍该版本时,他坦诚自己认识到之前版本的不足,“意识到曹雪芹想要描写的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这些所谓‘次要’情节和宝黛的故事一样重要。因此,这个版本我保留了很多女孩子们之间嫉妒或争吵有关的章节”^{[16]19}。正是在这样的他者质疑和自我质疑过程中,揭示出“译本对于原作的生命‘馈赠’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在不断延续与更新的过程中趋向原作生命之真”^{[24]608-618}。不得不说,几个缩译本的出现与不断完善对后来全译本的出现来说是很重要的尝试。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要意识到文学译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将其放置在一个文化双向交流更广阔和宏观的视野下进行把握,发掘文学译介的内在规律性,了解文学接受的历史性、阶段性与发展性,要根据文学译介所处的阶段性特点来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避免模式化、绝对化。如此,才能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把握文学翻译,进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M].上海:上海书店,2002.
- [3]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杨玉明.清末“庚子赔款”与留美运动述考[J].兰台世界,2013(4):27-28.
- [5]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27-34.
- [6]许钧.翻译论:修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7]王燕.作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红楼梦》:评《红楼梦》在西方的早期传播[J].红楼梦学刊,2009(6):310-315.
- [8]季淑凤.霍道彝《红楼梦》英文摘译考释[J].红楼梦学刊,2020(3):309-331.

(下转第96页)

- 学院学报,2019(4):19-26,129.
- [3] 刘晓东. 论儿童的哲学与儿童哲学课[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51-59.
- [4] 李墨一,王澍,于畅.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实践取向探析[J]. 外国教育研究,2019(5):30-40.
- [5] 徐容容. 儿童哲学内涵和儿童哲学教育目标与特征探析[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9(1):29-33.
- [6] 杨妍璐. 作为适度启蒙的儿童哲学教育:基于康德哲学的视角[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6):49-55.
- [7] 刘铁芳. 儿童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实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64-170.
- [8] 钟启泉. 批判性思维:概念界定与教学方略[J]. 全球教育展望,2020(1):3-16.
- [9] 任强,朱佳蕊. 儿童哲学与学科课程融合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9):40-46.
- [10] 刘晓东. 儿童精神哲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
- [11] 刘儒德. 论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内涵[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1):56-61.
- [12] 高振宇. 孔子对话教学视野下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重构与创新[J]. 教育发展研究,2018(增刊2):65-73.
- [13] 郑敏希. 儿童哲学团体探究:提供面向未知的行动力[J]. 教育发展研究,2021(2):36-42.
- [14] ENNIS R H. A 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J]. Educational leadership,1985(2):44-48.
- [15] 曾叶. 科学教育中幼儿核心素养培养的阻碍与对策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0.
- [16] 夏青. 批判性思维的育人价值[J]. 教育科学研究,2020(8):18-24,30.
- [17] 李墨一. 回到教育本身[D]. 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2020.
- [18] 杨建华. 理性的困境与理性精神的重塑[J]. 浙江社会科学,2014(1):104-111,158.
- [19] 朱锐.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关系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7.
- [20] 聂敏里.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J]. 世界哲学,2015(1):85-100,161.
- [21] 吕璐璐. 君子之道:《论语》中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论析[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2(9):1-16.
- [22] 古秀蓉,冷璐. 儿童哲学探究活动的教育评价研究[J]. 上海教育科研,2018(1):28-32.
- [23] “科学探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 探究式学习:含义、特征及核心要素[J]. 教育研究,2001(12):52-56.
- [24] 唐艳. 儒家性情学说视域下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建构[J]. 德州学院学报,2022(3):1-6.
- [25] 王海澜. 儿童的哲学:概念思考及哲学性问题特征分析[J]. 上海教育科研,2019(11):44-47,37.

[责任编辑 游 曼]

(上接第36页)

- [9] 王烟朦,许明武. 美国汉学家艾思柯译介《红楼梦》研究[J]. 红楼梦学刊,2018(5):254-269.
- [10] AYSCOUGH F. The Chinese idea of a garden [J].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3(1):15-15.
- [11] 钱林森,周宁.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美国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 [12] 江帆. 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
- [13] WANG C C. Translati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1922.
- [14] 刘泽权,汤洁. 王际真与麦克休《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编译策略比较[J]. 红楼梦学刊,2019(5):218-235.
- [15]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 [16] WANG C C. Translati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M]. New York: Wayne Publishers,1958.
- [17]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18] CAO X Q.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M]. JOLY H B,trans. Hong Kong: Kelly & Walsh,1892.
- [19] MCHUGH F, MCHUGH I.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 London: Routledge & Keagan Paul,1958.
- [20] 刘士聪. 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36.
- [21] 梅蕙华,姚军玲. 我对德译本《红楼梦》的几点看法:访德国汉学家梅蕙华[J]. 国际汉学,2015(1):14-17.
- [22] 王烟朦,许明武. 美国汉学家艾思柯译介《红楼梦》研究[J]. 红楼梦学刊,2018(5):54-69.
- [23] 刘云虹,胡陈尧. 论古典文学名著外译的生成性接受[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2):1-7.
- [24] 刘云虹. 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4):608-618.

[责任编辑 王 奕]